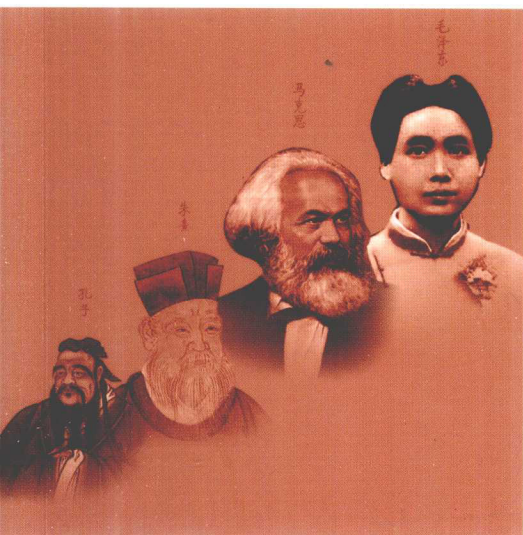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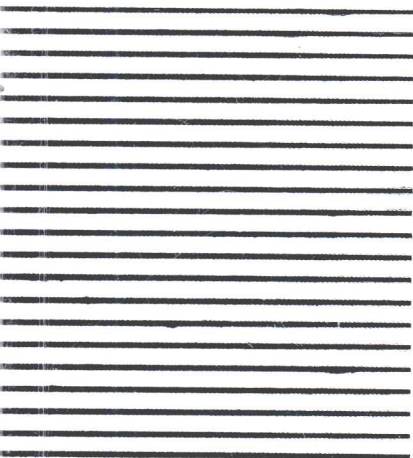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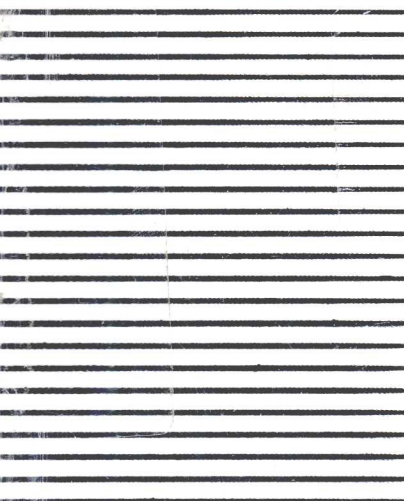




张允熠◎著



中国主流文化的 近现代转型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G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张允熠◎著

中国主流文化的 近现代转型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主流文化的近现代转型 / 张允熠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461 - 1254 - 1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史 - 研究 - 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3194 号

中国主流文化的近现代转型

张允熠 著

出版人: 左克诚

责任编辑: 张向奎 徐敏峰

责任印制: 李磊

装帧设计: 钱志刚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 0551 - 3533768 3533762

印 制: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 0551 - 5540000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41.75

字数: 601 千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461 - 1254 - 1

定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文化是分类型、分层次的复合结构。文化类型与人种、民族、区域、社会发展阶段密切关联。譬如所谓的“蓝色文明”(海洋文明或白种人的文明)、“黄色文明”(黄土文明或黄种人的文明),其中便包含着不同的人种所创造的不同文化的意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显然是以地理区域范围之别而划分的文化类型;“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是按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来划分的文化类型;“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则是按照生产工具的发达程度来区别文化发展程度和类型的,等等。在同一文化类型中还有层次的分殊,如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所有这些文化层次共同组成了同一时空条件下文化的复合性总体结构。而伦理文化、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宗教文化……则是基于文化的客体存在把它们分属于具有独特主体形态的文化体系中,以便于对文化进行分门别类的把握和研究。总之,文化的分类就像计算机系统中的目录树,在总体性的树干之上,还有无数枝叶末梢的分层,它们既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相互重叠。

文化转型,既可指一种文化分层类型的转换,又可指总体性文化类型的转变。如古代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的整体性消失,相继为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所取代,这种文化的变迁意味着人类文化史上的大转移、大变迁,是一种彻底的、颠覆性的转型。再如基督教文化取代“希腊-罗马”文化,虽然在精神文化层面也属于相对大的转型,但此种转型包含着新类型对旧类型的扬弃,即新质对旧质的部分吸收、改造和继承,这种文化转型可以称为文化发展中的“螺旋式上升”或“扬弃”,是一种人类文化史上经常出现的正面和积极的文化跃迁或“否定之否定”。此种文化转型的显著变化表现为外在形态的变异和时代精神的

增益,但其原创期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期”的文化基因或曰“常道”会被传承下来,形成不同文化系统间相互区别的本质属性,即价值核心。只要这一价值核心不至丢失,即使该文化系统可能一度跌至低谷,它总有一天还会卷土重来,此谓文化的“复兴”。相反,那就只能是彻底的覆灭,空留下令后人嗟叹的一堆堆失却灵魂和依皈的巨石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了。

本书所讲的“文化转型”主要指主流文化或曰主流思想文化即“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它属于那种“常道不死、新质叠加”的文化增益。如以公元前6世纪儒家文化的形成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标识算起,直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为止,中国的主流文化大致经历了三次较大的主要转型和三次“亚转型”。三次较大的主要转型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多元文化并立局面至西汉武帝年间趋于整合,终为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格局所取代——奉孔子为一尊的经学化的儒学登堂入室而成为中国皇家的正统官方哲学;大约又经历了千余年,至公元11到12世纪,程朱理学即“道学”或曰朱熹新儒学诞生,并于13世纪的元朝正式取代了原始儒学成为官方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标准,在以后长达六百多年的历史岁月里,新儒学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高峰期的正统文化和统治型意识形态,直至1949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儒家统治思想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哲学和科学意识形态所取代。中国主流文化的第一次大转型标志着多元文化并立向一元文化统领的转变;第二次大转型标志着原始儒学为新儒学所取代;第三次大转型标志着传统儒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中国近代主流文化历史性大转型的基本完成——这是一次旷古空前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转型。

魏晋时期玄学的产生和明代心学的出现以及清代汉学的复兴可以看作是三次影响主流文化走向的次级转型。魏晋玄学标志着儒、道思想的合流,其为印度佛教的传入在客观上做了思想上的铺垫和接引,如果说朱熹的新儒学是标志着儒家哲学思辨化的成功范例,魏晋玄学则是儒、道哲学向思辨化的理性哲学迈进的第一步,也是宋代新儒学“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前奏和示范;明代心学属于新儒学内部的反叛流派,曾经一度取代了朱熹理学在精神世界的领袖地位,它实际上代表着明代中期以后成长

起来的中国市民阶层或曰萌芽状态的中国本土资产者的意识形态；清代汉学的复兴一方面表现为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学术思想自身转换的内在趋势，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明末西学东来刺激之下的必然结果，戴震的学说既是这一趋势和结果的思想总汇，又是近代中国主流文化转型的历史与逻辑起点。不难看出，上述几种文化转型实际是儒学自身的转变，其中，宋明理学显示度最高、影响最大，而明清儒学的转型意义最为深远。这三次文化的次级转型处于三次主流文化大转型的中间环节，对于渐进型而非突变型的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文化的转换来说，“亚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过渡性和环节性作用。

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是若合符节的，恩格斯所说思想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导，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内在关联。然而反观中国社会，两千数百年来改朝换代频频而至，但真正意义的社会转型却十分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算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此前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举实际上只是这次社会大转型的序幕，正如同一台压轴大戏之前的开锣戏。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的文化转型不可能弃社会制度的转型而独语，但对于前此的几次主流文化转型，却可以就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而不必就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制度的转型过多地泼洒浓墨重彩。

上述可说是对中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两千多年演进过程的一个概观。关于这一概观的描述是长期萦绕在本人脑际中的一条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长廊，多年来——确切地说二十余年来，我的思路一直穿行回荡在这一精神的历史长廊之中。有心立说成著却又苦于庸事缠身，一直不能如愿。不过，无论我当年供职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人员时，还是我作为研究生撰写博士论文时，乃至我在大学供职担任教席期间，围绕着上述主题，已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发表了系列论文，虽然少有精雕细刻，但立意明确，目标恒常，有道可寻，完全可以基于这些前期研究的成果而形成专著。

适逢其时，有黄山书社张向奎君来访。向奎君原为我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时所主导创设的中国哲学学位点的第一届硕士生，他深知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自成一家之说，建议我尽快出书以饕学界。向奎君所言甚

善,余闻后心有所动,遂伏案半载,瀚墨笔耕,或增或删,或削或添,终成一书,蔚然有观。该书通体按主题层次和逻辑构架梳理编排,除两个处于中间环节的次级转型的文化形态即魏晋玄学和明代心学略而未及以待他日专述之外,笔端所至涉及到古今中西马、毛邓儒道墨,等等。其言似杂非杂,似泛非泛,议论发微,纵横阖辟,无不围绕着中国主流文化转型的时代主题,执一而贯之。

该著的学科立基为文化哲学的理念,从近代中国文化哲学的兴起切入中国主流文化的分野,进而论证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封建时代的官方哲学,儒学的历次转型实际上代表着中国主流文化转型的基本态势。分析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核及其现代转型的内在依据与现代性文化之间的汇通,是本书探讨的重点之一。然而,传统文化在其近现代的转型中,难以避免传统思维所带来的转型期阵痛和必然的惯性,这种阵痛和惯性既有正面价值,也有负面价值,不仅存在于儒家中,也存在于仍在发挥影响的墨、道、易和中医学诸家之中。分析和剔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思想、思维,对于从深层次上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转换的必然性具有理论之标杆作用。在中国主流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中,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文化的承载者、创造者、传播者和评判者,他们身居于历史和时代的负荷之下。由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转型是在中西会通、新旧杂糅、内困外忧的时代背景下前行的,知识分子在执行从传统接引现代的历史使命中,其灵魂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时代的洗礼,因此,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苦旅的过程。在这里,有一个千年之问必须回答:近代西学东渐,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为什么唯有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艺压群芳以至终取儒学而代之呢?无疑,这有着深层的文化背景和学理渊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路历程中可以窥其豹斑,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比较和学脉追问中更能引发人深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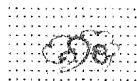
本书正是立足于上述内容而展开论证和阐述的。除此之外,书中还分析了现代新儒家的几个案例,对中国当代文化的构建发微阐义,对中国主流文化的未来形态进行预测、解读。总之,本书的付梓问世,算是对该项专题的一个研究结集,但远不是我本人满意的心得结晶。自己总感到

文中有些重要部分仍是粗线条的,个别观点也有待调整或修正,随着新资料不断发现,拙著中来不及反映和总结的内容,还有待他日修订再版。更重要的是,该书中的核心观点是否能为读者接受,还需假以时日,让历史去回答。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拙著的出版问世,要感谢黄山书社及其编辑与校对人员认真负责的态度,感谢左克诚社长和张向奎主任,没有他们对学术的挚爱和对学者的鼎力提携之心,该书的出版不会这么顺利的。同时,对上海师范大学的领导和同仁,以及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前辈学人与师友,在此也真诚地道一声感谢。

张允熠

2010年4月于石榴园寒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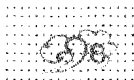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

第一章 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跌落与转型	001
第一节 文化的反思	001
第二节 中国文化哲学建构的话语平台	016
第三节 儒学的跌落和近代哲学革命	029
第四节 “三足鼎立”与文化整合	045
第五节 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主要特征	055
第二章 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依据	067
第一节 儒家哲学的超越精神	068
第二节 儒学实用理性主义与近代实用主义的会通	084
第三节 儒家哲学的逻辑	093
第四节 中西人权观源流比探	102
第五节 儒家道统与民族精神	112
第三章 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传统惯性	124
第一节 儒家文化中的性别歧视	125
第二节 《老子》哲学的实质	137
第三节 墨学的“兼爱”与“辩证唯物主义”	145
第四节 《易》学四派说	161
第五节 从《淮南子》到董仲舒	174
第六节 从中医学看中国传统思维	184

第四章 文化转型中的精神苦旅	197
第一节 胡适实用主义思想中的儒学情结	198
第二节 中国人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210
第三节 “小康”、“大同”社会思想源流新探	226
第四节 从科学、科学主义到科学发展观	233
第五节 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	244
第五章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深层背景透析	256
第一节 从事物范畴看儒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学理关联	257
第二节 朱熹哲学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268
第三节 从宋、汉学到戴学	287
第四节 16 至 18 世纪的“中学西传”	301
第五节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背景的 探讨	313
第六章 文化转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心路	331
第一节 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	332
第二节 毛泽东与儒学	340
第三节 毛泽东的理想主义	351
第四节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363
第五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73
第七章 现代儒学思潮与文化转型	385
第一节 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	386
第二节 方东美的《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	397
第三节 现代新儒家的“知识分子”观	406
第四节 当代新儒家与“文化中国”	422
第五节 当代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宣言	434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442

第一节 马克思眼里的中国人 443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论近代中国革命 458

第三节 哲学的困境和黑格尔的幽灵 468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无神论 483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脉渊承 494

附录：“勇气”与“儿戏” 516

第九章 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 529

第一节 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探源 530

第二节 邓小平理论中的和谐思想探析 539

第三节 社会心态与社会稳定 545

第四节 从传统文化解读“科学发展观” 555

第五节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构建 576

第十章 中国文化转型的愿景 588

第一节 中国文化向何处去 589

第二节 关于“马魂、中体、西用” 612

第三节 融会中西马，创造新文化
——张岱年晚年文化哲学思想拾贝 619

第四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内涵 634

参考文献 646

第一章

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失落与转型

- 文化的反思
- 中国文化哲学建构的话语平台
- 儒学的跌落和近代哲学革命
- “三足鼎立”与文化整合
- 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主要特征

我们从传统文化中走来,我们从传统文化中走出。五千年的文化与传统是我们脊背上沉重的负担,又是我们民族坚毅前行的“第一推动力”,延绵悠远,涓涓不息。文化与哲学的变迁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旋律,然而“传统”的脐带仍无法割离,传统在浴火中重生。放眼望去,中国近代文化哲学的重构在中西文化大交通的浩淼背景下崛起,中国近代文化哲学的构建与中西文化两大系统的比较参验关联。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近代文化与哲学的历史性变迁,造成了统治中国主流思想界两千多年的儒家哲学的历史性跌落,——不过,这种跌落也仅仅是从尊荣的官方宝座上跌为“平民”,其身軀仍在,其命脉续前承远。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中,马克思主义如旭日东升喷薄而出,随之,中国思想文化界马、中、西“三足鼎立”的大局淬火而成。

第一节 文化的反思

文化人类学者往往从人的自然形态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探求一个民族的文化渊源,这固然不失为一种索根求本的科学方法,并渗透到考古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去,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它也为社会

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所张目，希特勒的“日耳曼文化至上”论便是这一谬种的极端形式。中国自明代中叶在与欧洲人种的文化交往中，始有中西学之对垒，进而演为中西学之争。“原来中国几千年所接触者——除印度文化外，都是文化低下的民族，因此觉得文化为中国人所独有”^①，但从鸦片战争后，欧洲人用他们的物质文化——洋枪、大炮、火轮船轰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这时才意识到在地球的另一方，还有一群具有高度文化的人类存在——“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藏有‘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②。同时，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者所鼓吹的“西方文化优越，东方文化落后”，“白色人种是优等民族，黄色人种是劣等民族”的谬论接踵而来，更使国人蒙羞受辱，痛定思痛。从此，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求索。然而，“好古”的习性难改，无法抑制炎黄子孙对自己所创造的传统文化的迷恋，先秦、两汉、盛唐的灿烂余光，时常感召着他们做起“中国文艺复兴”的美梦。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导致对中国人性的反思，于是忧伤者有之，忌愤者有之，呐喊者有之，醒悟者有之，狂热者有之，逃遁者有之……于是又有“改造国民性”之说，又有“文化救国”之说。总之，一百多年来的文化反思，表明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努力从民族文化回顾的视角中寻找中国近现代之所以积贫积弱的原因和这个古老民族前行的方向。

但是，什么是传统和文化？传统和文化在社会变迁中居于何种地位？其前景如何？欲回应这些问题，可作如下思考：

一、文化是分层次的系统结构

何者为文化？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较狭义的文化可以包括整个上层建筑，更狭义的文化仅指意识形态。这样，社会文化系统实际上分为三个层次。最外层是物质文化，包括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一切器物、精神产品和技术（物质发明和技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人所共睹，在此不作详细分析）；中间层是

①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②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人际关系、习惯行为和规范行为;核心层是社会意识,包括人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结构。英国学者泰勒认为:文化是一种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及作为社会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泰勒的文化定义,其特点在于“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所获得的能力”,从而把文化放在群体互动的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氛围中来考察,使文化作为人学的一个范畴,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了解、分析人类的行为提供了一种工具。我们通常意义上所使用的文化概念,往往指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细微部分,如文学、艺术、音乐及哲学的涵养和创造等等。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不但包括这种精神生活中的细微部分,而且包括一个社会群体所共同拥有的整个生活方式。由于社会行为本身存在着差异,致使适合于群体性的主流文化之外,还往往存在着次级文化(Subcultures)。悠久而较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由世代相因而形成所谓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影响着现代人的行为,并产生了只是社会许可或期待的行为。总之,特定的文化产生在特定的民族群体聚居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及其社会心理的环境之中,是一种分层次的复杂的系统结构,它也可从以下三种系统的层面上体现出来:

(一)信仰系统

信仰系统是由人与实体(reality)即主体与客体的相对关系中涵演出来的。它包括三个子系统,即自然、社会、上帝的系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是关于天、地、人“三才”的知识。对于天地的认识往往分化为两极:远古人类在自然的威慑下,由对自然的畏惧到对超自然力的崇拜进而到对上帝的信仰形成了原始宗教;古希腊的智者困惑于自然物和自然力的神秘莫测,执意要用智慧的灵光去探照其中的玄奥,寻求人与自然实体的次第关系,这就是初级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渊藪。尽管当时科学与哲学是浑为一体的,但却发出了近代文明的嚆矢。在西方,对天地的认识经历了自人出发而走向宗教和科学的两极对立,从而形成了西方宗教与科学的文化传统。中国则不然,中国的先哲们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对天神的求索完全是个远离现实的

玄学问题。荀子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是要人们放弃对上帝、天神的信仰，而役万物为人所用。这就把对天地上下两端的求索用“中庸之道”的方法归之于人，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重自然，还是重社会？是“信仰理性”，还是“实践理性”？东西方哲人发出的这种似乎对立的文化先声，实际上是根于各自的文化土壤而产生的一种自然选择的功能效应，在这里，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优劣界限。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宜根据它的信仰系统的性质而定。从这个层面上理解的文化，实际上是个宗教、哲学、科学综合的知识体系。

（二）人格系统

人格是一个人的品格及其价值的总体，社会人格的自我完善往往表现为对一种理念的追求，形成理想系统。例如中国文化的人文特征，无时不散发着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其实，中国文化是一种极缺少宗教信仰的文化，如果有信仰的话，这种信仰便是“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儒家如此，道家也是如此。它涉及到道德秩序、价值观念、对群体行为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审美意识。如道家的“道”是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儒家的“礼”是一种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而“仁”则是一种伦理观念和心理结构，在价值判断上以“得道”、“行礼”和“为仁”为标准。所谓“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道”、“礼”、“仁”的和谐一致，即具有审美旨意的精神与自然统一、情趣与景致统一的特征。

在理想人格的实现问题上，从来就是儒道互补的。唐宋以来，逐渐合儒释道为一统，但儒家仍具有主导意识、群体意识和规范意识的社会功效。规范和价值本来是矛盾的，但又是不可分的一对理念和信仰的力量。价值是抽象的理念，涵盖着人们心理上向上追求并外化为标准的信力，而规范恰是从相反的方向上遏制有损这种追求的社会行为，其限度以价值为准，并在客观上起参与社会控制的作用，形成一系列具体规定。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是中庸和谐、天下为公，并附之以忠孝节义、仁智礼信等，这些组成了古代封建社会评判社会行为的价值系统，这是正向的。但是，从反方向上，它又是一组规范系统，用来束缚人们不忠不孝等逆反行为。再

如西方的价值系统是民主与科学,民主鼓励人们参与决策的过程,科学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反之,它也参加社会控制的过程,涵演出一系列行为规范,以保障民主和科学的社会地位。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儒家思想,两千多年来,一直作为正向价值的理想系统和作为反向规范的控制系统发挥着指导、束缚人们行为的社会效用。

(三) 习惯系统

不同的文化产生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涵演出不同的文化,其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天然的差异形成了各种文化特有的习惯系统。所谓习惯,即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这种相对处于稳态的结构世代相因,通过人们的行为需要保留下来。它又可分为三个子系统:

1. 语言、文字。语言的产生是文明的曙光,表明了人类思维力的形成。文字是语言的物质符号,它使本具流动性、变动性的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相对稳定下来。语言、文字是习惯性的文化标志。一个群体讲何种语言,书何种文字,通常表明他们隶属于哪一种文化类型。语言、文字既然是思维的产物,同样也体现了思维的特征。如中国的方块字,具有形象(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特点,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古老传统(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古老的活文字)、审美情趣(书法艺术)、辩证逻辑(字体结构本身及用字造句时所强调的对仗、对偶、押韵和朗读技巧上的抑扬顿挫等),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内守执着(背了五千年的沉重包袱,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化系统,至今仍有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即是通过这种原创性文字为工具世代相传至今。可以说,每一个方字块都是一个遗传基因。与此相反,西方的语言文字以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形式传播着西方文化,体现了西方思维的特点。拿拉丁语言系的文字为例,这是一种表音文字,比起表形、表义来说,表音文字是文字发展史上更有利于传播和交流的文字形式。它书写的流畅和字法、句法结构的简练,体现了西方人擅长于形式逻辑的思维特点。

2. 风俗。由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人文条件形成的人群风尚叫做风俗。风俗相沿积习,形成传统,历久不衰。如婚俗、葬俗、礼俗、乐俗、食俗、住俗乃至衣着装束和性行为等,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差异很大。由于

中国主流文化的
近现代转型

风俗的差异,对待同一社会行为,不同的民族有着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如中国人认为“礼多人不嫌”,而有些民族却认为繁文缛节和过分的客套寒暄惹人讨厌;中国人婚礼尚红色,西方新娘却要披白纱,而白色恰是中国丧服的颜色;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就餐用刀叉,等等。这种风俗的不同,表明了文化上的差异性。

风俗虽然处于文化结构中的较低层面,它却是旧的习惯势力的混凝土。每次社会变迁的到来,最难触动的文化外观层面便是风俗了,所以我国古籍《诗经》上就有“移风易俗”之说。近代社会学家也注意到了“俗”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明末王船山先生顶痛心‘俗’,他曾说过一句话,非常深切动人。他说:‘恶莫大于俗’。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切反省的一句话。”^①当然,王船山所说的“俗”不仅指的风俗,还有庸俗的“俗”字的含义,诸如官场上的阿谀奉承,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相互利用等,皆是俗不可耐的流弊。“俗”字确是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的阻梗之一。

3. 民族心理结构。民族心理结构是民族文化中积淀最深的深层结构,民族心理素质乃为传统文化的遗传心理基因,它的外在化便是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的群体意识表现出来的特性通常又称民族性。民族性是一个中性概念,为同一民族的人群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二、传统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冲突

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任何传统文化,不论它如何执着和保守,最终都要流动和变迁,稳定只是相对的,不稳定是绝对的,随着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力量、政治体制结构的改变,尤其是人与实体、生产者与生产对象的相对位移,群体的观念意识、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各个层面势必也要随之改变,这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 社会流动造成文化流动

社会流动是水平层面的人群位移。在古代,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

^① 梁漱溟:《精神陶炼要旨》,《乡村建设》第4卷第七八合刊,1934年。